

卷 首 语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三卷研究唐中叶至元明之际的经济思想，具体的起讫时期为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编次序列承接前两卷，由第七编第三十九章至第十编第六十二章。全卷共包括4编24章及第十编的一个附录。

第七编（本卷首编）的研究范围为唐中叶至晚唐、五代。

安史之乱是唐代盛世终结的标志，唐政权自此进入衰乱相继的局面，但是，在经济思想方面却打破了盛唐不盛的状态，开始了一个较有活力和较为丰富多采的新时期。唐肃宗至唐德宗之间（756—805年）刘晏、杨炎在理财工作中的改革及陆贽对经济问题的议论，揭开了这一新时期的序幕，初步显示了此后一个长时期经济思想发展的新趋向。经历中、晚唐及五代，到北宋时期，进而使这一新时期的经济思想发展到粲然大备的地步。

唐德宗死后，顺宗即位，仅半年即因病传位太子，是为宪宗。唐宪宗用兵力平定了不服从中央政权的各藩镇，基本上恢复了唐王朝一统局面，史称“宪宗中兴”。但为时不久，即又陷入分裂割据的状态。

从唐宪宗元和时期（806—820年）开始的几十年中，一些人士，尤其是韩愈、白居易、元稹、李翱等，广泛探讨了赋税、工商业、货币、对外贸易、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以及人口等问题，把刘晏、杨炎等人开启的新局面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经济思想的内容更丰富了，在许多问题上也比前一个时期更有理论深度了。

第七编共 4 章 第三十九章韩愈 第四十章白居易、元稹 分别论述了中唐经济思想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第四十一章介绍了中唐时期某些经济思想内容不多、但较有特色的人物李翱、李珣等。第四十二章为晚唐、五代的经济思想。晚唐、五代是分裂、动乱极其严重的时期：王仙芝、黄巢农民大起义，彻底摧毁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唐政权为背叛并镇压农民起义的朱温所篡夺，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分裂、混战的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遭到了巨大破坏，中唐时期经济思想比较活跃的局面，也重新陷入衰微沉寂。不过，这段时期不是很长，而且，经济思想也并不是贫乏到完全无足称述的地步。例如皮日休的‘励民成业’论 还是较有特色的，他对土地兼并的批判 虽片言只语 却很有新意。后周统治者郭威、柴荣父子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及其指导思想，对恢复 几十年战乱所破坏的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宋初的经济政策也有重要影响。因此，本书一改过去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空缺晚唐、五代的情况，专设一章论述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

第八编论述宋代的经济思想，共包括 12 章。

第四十三章研究北宋时期经济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李觏。自唐中叶以来经济思想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新变化，至北宋时期已日益明显、日益完整地表现出来，而在李觏的著作中这种状况得到了典型的体现。李觏对宋代的各种主要经济问题，如土地兼并和农业生产、工商业、财政困难和财政危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过剩人口（冗民、浮民）等问题 都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他的这些探讨 组成了一个以富国问题为中心 以强本、节用为支架，包括平土论、抑末去冗论、轻重论及保富论等在一起的一个思想体系。

面对着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困境，李觏积极呼吁改革。他对各种经济问题的探讨、议论，主要就是为其改革主张服务的。他极力推动范仲淹进行改革（庆历新政），又为稍后王安石的改革（熙宁变

法)准备了思想基础。

第四十四、四十五章分别论述和李觏同时的范仲淹、欧阳修、苏洵、张载等。这些人都有改革的要求，其中有的人(范仲淹)还有所行动。他们的经济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能和李觏相比，但在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例如，苏洵、张载在井田制问题上的观点就别具一格，在当时及后代的某些时期，都有相当影响。把这些人的经济思想同李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对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经济思想的概貌，可有较完整的认识。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变法以财政、经济改革为主，因此，它必然在经济思想领域中激起轩然大波。环绕变法本身尤其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各项新法展开的论争，构成了由此至北宋末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其余波还延至南宋。

本编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章就对变法持不同态度的人物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其中第四十六章探究变法主帅王安石的新法及其思想基础；第四十七章评述变法反对派首领司马光的经济观点；第四十八、四十九章则论述变法时其他一些有关人士张方平、沈括、苏轼、苏辙等对变法的意见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

第五十至五十二章论述北宋末至南宋初的一些人物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观点。其中，周行己、叶梦得的经济思想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北宋末期社会经济状况的特点；方腊对北宋统治者的批判及其组织起义农民经济生活的经济思想，在宋代农民起义中是保留得最完整的；康与之、苏云卿等人的经济思想，反映了两宋之际人们在战争惨祸下走投无路的苦境；林勋、董煟的经济思想则体现了南宋初期一些士大夫人物为偏安江南寻求一个较稳定的经济基础的努力。

第五十三及五十四章分别考察南宋功利思想代表人物陈亮、叶适及道学家朱熹、陆九渊的经济思想。南宋时期是道学发展的高

峰，而功利之学也因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崛起而盛极一时。功利之学和道学在经济观点方面也有很大分歧。陈亮、叶适是当时功利之学的旗帜，而朱熹、陆九渊则分别是南宋道学中理学和心学方面的大师。研究他们的经济思想及其相互之间的分歧，对认清南宋时期经济思想的特点及发展规律，是十分重要的。

第九编的研究对象是辽、金、元的经济思想。

宋、辽、金、元时期是继东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个长期民族纷争、对立的时期。宋王朝诞生以前，强大的契丹（后来改称辽）政权早已存在。宋政权建立后，长时期处于和辽的南北对峙中。后来，西夏崛起于西北，又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金灭辽，把宋统治势力驱逐到秦岭、黄河以南，从而又形成了宋、金、夏三国鼎立。再后蒙古崛起，相继消灭金、夏，建立元朝，一个时期又成为宋、元对峙的“南北朝”，终于元并宋统一全中国。宋、辽、金、元民族政权分立对峙的局面，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长达三百余年，与东晋、南北朝持续的时间相近。

但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一开始许多少数民族逐鹿中原，旋兴旋灭，直到鲜卑拓跋族的北魏兴起，才建立起统治北方的稳定政权。而宋、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辽、夏、金政权，一开始就是强大的、巩固的，而蒙古——元政权，不但自始就强大无比，而且最后统一了全国，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一统王朝。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接触中，发展水平的差异已经缩小，因此，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能够较快地适应中原地区的先进经济和文化，从而能够建立起稳固统治中原甚至全国的政权。

类似的情况在经济思想领域中也表现出来。辽、金时期，尚未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但辽、金人士对经济问题的议论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至少是北魏以前少数民族逐鹿中原时期所不能相比的。元代的经济思想，则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比较丰富、多样，具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较历史上的某些汉族王朝，也并无逊色。

第九编的研究，以元代的经济思想为主，而仅以一章，即第五十五章概述辽、金的经济思想。

第五十六章研究元初及宋元之际一些人士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等人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这些人都是对奠定元帝国统治规模起过重大作用的人士，他们的经济思想，也对元代的经济思想有引路和奠基的作用。

元王朝疆域广大，超轶汉、唐，而且在建立一统王朝后一段时间，战攻不息，因而财政用度极为浩繁。重用理财之臣是元王朝的建立者元世祖统治的一个明显特点，理财思想是元代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五十七章研究元世祖重用过的三个理财大臣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的理财措施及其所体现的财政、经济思想。这三个人前后相继，主持元政权的理财工作，而且都曾达到执政的地位，有的甚至位居首相。在元代的理财工作和理财思想中，他们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五十八章论述的马端临、邓牧二人，都是南宋遗民，入元后隐居不仕，著书立说总结历史经验，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的著作都提到经济问题，不乏值得重视的思想、观点。他们的经济思想是元代经济思想中的一个独特的类型。

第五十九章的研究对象刘基、王祿、高则诚都是元明之际的人，体现他们经济思想的作品则皆作于元末。他们的经济思想所反映的现实是元末朝政腐败、统治势力贪婪酷虐、社会经济凋敝、黎民百姓水深火热的情况。

第十编（即本卷末编）探讨宋元时期的其他经济思想。所谓其他经济思想，是指不能只归入宋代或元代，而又具有重要性的经济思想。这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类是汉传佛教的经济思想。

佛教自东汉初传入中国的汉族地区，在长期的传播中适应汉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而使自身不断有所发展、变化，由一

种外来的宗教逐渐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在对待经济问题的态度和观点方面，也逐渐有了许多与印度佛教不同的特点。这类特点，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渐积累，终于形成了一种较为明显、较为集中地体现着汉传佛教特色的经济思想。这种经济思想的一个较为完整、较为典型的形式，就是禅宗的农禅思想。

农禅思想开始是由唐代中叶的怀海在其手订《百丈清规》中体现出来的。农禅思想在宋代又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并在佛教丛林中日益普及，到元末还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命怀海十八代传人德辉综合宋元时期仿照《百丈清规》编订的各种《清规》辑为《敕修百丈清规》颁行天下僧寺一体遵行。

第十编第六十章以农禅思想的性质、内容及其发展、变化为主要线索，探讨这一典型体现汉传佛教特色的经济思想。由于农禅思想有这样一个长期发展、完善的过程，把它仅作为某一王朝的经济思想，自然是不适当的。

第二类(第六十一章)论述宋、元纸币思想的发展。

我国是世界最先产生纸币的国家。北宋太宗时期已开始出现纸币，但到北宋末才有较值得注意的纸币思想。南宋纸币在货币流通中已占主要地位，同时，纸币思想也日益发展、丰富起来，成为南宋经济思想中最为突出的内容。与南宋对峙的金，也效法南宋行使纸币。元代在宋、金纸币的基础上继续行使纸币，并且把纸币规定为全国范围中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与此相应，元代的纸币思想也较南宋更有发展。可以说，南宋至元，代表着中国传统纸币思想的第一个高峰(另一高峰在近代鸦片战争前后)。

正因如此，把本卷所涉及的纸币思想只作为宋代或元代的纸币思想，都是不妥当的；分别列入两代，则不利于揭示其连续性和发展规律性。把宋、元纸币思想作为一个专章，既能显示出宋、元在传统纸币思想发展史上同属一个阶段，又便于通过联系、对照反映出各自的特点。

第三类(第六十二章)概述宋、元农书中的经济观点。

由于农业在封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首要地位以及中国历来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的重要性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中历来都受到强调。历代都有农书之类的书籍的编写。这也是重农的一种表现。农书本身是关于农业技术的书籍,但或多或少地也都包含着一些经济观点。因此,《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历来重视对农书中经济思想的研究,第一卷、第二卷都有这方面的论述。宋、元两代编纂的农书保存下来的较多。为此,本书第十编特设专章对现存的宋、元四种农书,即宋陈旉《农书》、元官颁《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进行经济思想方面的发掘和研究。

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中国北方大平原地区形成了面积广大的低产田。在如此宜农的地区出现了如此广漠的低产田,这对一个统一的、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一个沉重的不堪忍受的负担。如何改造低产田以改变北方大平原农业生产的面貌,这一问题的意义远超过地区范围,而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

在宋、元时期,这一问题已逐渐引起人们的关心。宋何承矩和元虞集等人提出了在河北农业低产区蓄水种稻以增产粮食的主张。虽然他们的直接出发点还是防务或供应首都粮食等具体的要求,但已是后代改造低产田思想的嚆矢。随着后世人口的巨大增长,这种思想的战略意义也越明显。

改造低产田的思想自然也是关于农业方面的思想,但与第六十二章宋、元农书中的经济思想不同,不能合并论述。同时,由于这方面的思想资料不多,又不宜辟为专章,所以就把它作为第十编的一个附录来处理了。

在本卷的研究、写作过程中,特别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经济思想资料的发掘问题。

占有充分、翔实的资料是提高研究、写作质量的基础。《中国

经济思想通史》的研究、写作 历来重视此问题 把发掘、整理经济思想资料作为提高研究、写作质量的先务。第三卷研究的时期，保留下来的资料远比前一时期（第二卷涉及的时期）丰富得多 宋代尤其是历代封建王朝中文献资料保存得最多的时期之一。这为提高研究质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给发掘、占有资料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本卷研究、写作过程中 为此作了很大努力 发掘、利用了同类著作未涉及过的许多经济思想资料，诸如晚唐五代的经济思想，辽、金的经济思想，宋、元时期的治生之学，汉传佛教的经济思想等 都是本书首先进行资料发掘和研究的 皮日休、郭威、柴荣、叶梦得、康与之、苏云卿、陆九韶、耶律昭、高汝砺、刘秉忠等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物，也是由本书首开其端。

第二 体系、结构的改革、创新问题。

在全卷的体系、结构方面，实现了两个较大的创新：一个是在时期划分方面，不是单纯以王朝的界线来划分中国经济思想史阶段，而是以经济思想本身的阶段性为依据，将第三卷研究论述的时期定为唐中叶至元明之际。另一个是采用了综合论述和专论相结合的编列方式。

对分期问题，《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向来不主张单纯以王朝统治的时期作为分期依据。因此，第一卷就没有按照习用的分期办法，把秦统一前作为下限，而是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为标志，把下限定在西汉宣、元之交；第二卷也不是像通常的分期办法那样由秦统一写至隋、唐，而是自西汉末写至唐代安史之乱后一段时间（唐德宗时期）。

基于同样的考虑，第三卷虽然主要内容是宋、元时期的经济思想，但也并不把它写成与王朝起讫时间吻合的宋元经济思想史，而是由唐中叶（宪宗时期）一直写到元明之际。

同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是较为活跃，较为丰富

多采的。春秋、战国至西汉中叶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形成的时期，经济思想特为活跃，各种各样的经济思想不断涌现，有成就的思想代表人物层出不穷。到西汉中叶后 这种局面基本结束 此后 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即进入一个长期缓慢发展的局面。自西汉末至清代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未能再出现像春秋、战国至西汉中叶那样的群星竞辉的状态。但是，长期缓慢发展不等于停滞。正如本书第一卷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学术领域 并未出现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黑暗时代”。中国经济思想从长期看 还是有所前进的 只是前进缓慢 而且呈现为阶段性的起伏：有的时期处于比较沉闷的状态，有的时期则较为活跃。第二卷所研究的时期属于前者，本卷所涉及的时期，则属于后者。

安史之乱结束了唐代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局面，也结束了经济思想领域中盛唐不盛的状态。安史之乱后一段时间，刘晏、杨炎在财政经济领域实行的改革，反映了唐中叶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也开始显露出此后一个长时期经济思想领域中的新的发展动向。不过 刘晏、杨炎都是实干家 而非思想家 都不曾著书立说，这种新的发展动向在他们那里还只是通过政策、措施折射出来 而不曾在思想、学术领域有明显的、直接的表现。从唐宪宗时期开始 情况就不同了。文化、学术领域中有一批人物如韩愈、白居易、元稹、李翱等 对许多经济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写出了不少涉及经济问题的文章，包括若干经济专文，使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一个比较活跃的局面。中唐时期的经济思想，不论就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达到了唐代的顶峰。

晚唐、五代的社会动乱，使经济思想领域又经历了一个延续几十年的低潮，到宋代则达到了比中唐时期更活跃、更繁盛的局面：经济思想内容的丰富、形色的多样以至理论探讨的深入程度，都大大超过了中唐时期；在有些问题上还超过前代任何时期，或者是前代未曾接触过的。例如，对土地兼并的批判，对保富及反对抑兼并

主张的论证，以及对人口问题的探讨，其深度和水平都超过前代；对纸币问题的论述，则是从宋代才开始的。宋代的某些经济思想代表人物，例如李觏和叶适，其成就都超过了东汉王符、西晋傅玄等人，而为西汉以下所罕有。

元代的经济思想不如宋代丰富多样，但基本上仍保持着比较活跃的状况。在某些方面，如纸币思想、重农思想等，还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前进。

经济思想史一般是采用综合论述的方式，即以时间为序，对各时期的经济思想代表人物的各方面经济思想、经济观点，综合地加以分析，而不以经济思想自身的类别（例如土地思想、工商业思想、货币思想、财政思想等）为序，专题地、横面地加以论列。但是，综合论述的方法在有些情况下也会遇到困难：有的经济思想独特性较大，不易与其他思想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地考察论述。例如，道教及佛教的经济思想，不为一般谈论经济问题的人所关心，因而很少有谈论其他经济问题的人兼谈佛教或道教经济观点的情况，也很少有佛、道教信徒谈论世俗经济问题。^①因此，对佛、道教经济思想，就只能以专论的形式进行考察。

有一些经济问题，例如宋、元时期的纸币问题，对之关心的人特别多。有些谈论纸币问题的人也较多地谈论过其他经济问题，自然可以将其纸币思想同其他经济思想放在一起综合地论述；但也有许多人只谈纸币问题而很少涉及其他问题，或者在其他经济问题方面并无什么值得重视的见解。对这类思想，如果只采用综合论述的方式，就势必有许多重要的内容不能纳入综合论述的体系之中，从而会使有关时期经济思想的全貌难以如实地、充分地揭示

一些政治道士、政治和尚（例如刘秉忠）成为帝王谋主者例外。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是穿着道袍、袈裟的官员，世俗的政治经济问题当然是他们所关心的；不过，他们在佛、道教经济思想方面却不会有什么兴趣。

出来。

其实，采用这种综合论述与专论相结合的方式，并不自本卷始。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的第一、二卷都包含着若干专题论述的章节。例如，第一卷对轻重论，第二卷对南朝的货币思想和北朝的均田思想，就均设专章论述。但是，像第三卷这样以整个一编进行专题论述，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综合论述与专论相结合，就成了第三卷在体系、结构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三 思想、理论研究的深化问题。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历史遗产的一部“通史”要求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新的前进。第三卷论述的时期经济思想资料较多，这是研究者所熟知的。但发掘、整理更多的思想资料，只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要使研究成果真正具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水平，就必须对发掘、整理出的思想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①。必须从纷繁的经济思想资料中找出其所体现的一个个经济观点，并且找到这些经济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尽可能把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为有内在联系的经济学说来把握；对各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思想代表人物，还要把握他的经济思想的总体特点，并尽可能探寻这一总体的内在联系，把他的经济思想作为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来把握。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三卷在资料发掘上下了较大功夫，在研究、论述的面上比同类著作有相当的拓展。但是，更艰巨的任务还在于思想、理论研究的深化上。对所论述的经济思想代表人物，本卷都不止于介绍其主要的经济思想资料及具体的经济观点，而且力求揭示其经济思想各方面的内在联系，揭示其经济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时代背景，揭示其同前人及同时人经济思想的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

源流和同异。这种研究使各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都能呈现为一个有多方面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一些具体经济观点的集合。对一些次要的代表人物，也尽量从其较突出、较有特色的经济思想中揭示其深层内涵，使其呈现为时代经济生活某一方面的思想、理论反映。

第三卷所研究的经济思想代表人物，除了一些主要人物列为专章外，多数是几个人合并于一章来论述的。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把哪些人物并为一章，也主要是从其思想的性质和特点来安排的。这样，在同一章中论述的几个人物，就显示为当时某一类型经济思想的代表，而不仅因为他们是同时人。

参加第三卷撰写的人除主编赵靖、副主编石世奇外，尚有裴倜、孙树霖、张守军、陈为民、郑学益、张劲涛、吴丽红、周常生等。具体的分工是：

- | | |
|-----|---|
| 赵 靖 | 卷首语、第四十二章、第五十一章、第五十五章、第五十六章、第五十七章、第五十八章、第五十九章、第六十章、附录 |
| 石世奇 | 第四十章、第五十三章 |
| 孙树霖 | 第四十六章、第四十七章 |
| 张守军 | 第四十四章、第四十五章 |
| 张劲涛 | 第四十八章、第五十章 |
| 郑学益 | 第四十三章 |
| 裴 倜 | 第五十四章 |
| 陈为民 | 第五十二章 |
| 吴丽红 | 第四十九章 |
| 周常生 | 第六十二章 |

此外，尚有三章都是由两人共同撰写的。它们是：

第三十九章、第四十一章 由赵靖、张守军共同撰写。

第六十一章

由赵靖、陈为民共同撰写。

*

*

*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三卷在写作过程中，承内蒙古自治区区委党校副校长戴美德同志、大连集装箱制造公司总经理萧麟同志，先后对在呼和浩特和大连组织讨论会惠予帮助，大力提供方便；当本卷研究经费支绌时，萧麟同志还以个人财力给予资助，对研究、写作工作的顺利完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于此并致谢意。

赵 靖

1996年5月1日

第七编

中唐至五代的经济思想

第三十九章 韩愈

第一节 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一说为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一带)人。《旧唐书》说他是昌黎人,系指“郡望”而言,也正因为此,人们称他为“韩昌黎”。

韩愈少孤贫,由寡嫂抚养长大,苦学砺志,自称“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能文”^①。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中进士,十年之后,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继而任监察御史,因上书极论宫市之弊,触怒唐德宗,贬为阳山县令。顺宗永贞元年(805年)改任江陵法曹参军。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征为国子博士,历任都官员外郎、河南县令、职方员外郎、比部郎中、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等官。元和十二年,因支持宰相裴度征淮西叛将有功,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宪宗迎佛骨进宫供奉,韩愈上书切谏,触怒宪宗,几至丧命,经裴度等人解救,远谪潮州(今广东潮阳)。次年移官袁州(今江西宜春)。穆宗即位(820年)召回任国子祭酒,后又历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以及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

韩愈是唐朝有名的古文家。魏、晋至隋、唐,流行骈体文,堆砌辞藻,文风日习于浮靡。这种情况,日益引起一些士大夫的不满。中唐时期,有些人出面提倡古文,独孤及、梁肃等人倡导最力。韩愈受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与凤翔郑尚书书》。以下引韩愈言论只注篇名。